

← (上接13版)

“分析”，非驴非马，而且几句几行之后，再也无话可说，真可谓自不量力。

1958年秋天，大学毕业，分配至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组。

他把自己的研究经历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。1978年以前，是第一阶段。这个时期，主要是参加集团项目。“在大学时，我受政治运动的影响，逐渐形成大集体的想法，认为始终在集体中则毕生一路平安，确定只做集体工作，不搞个人项目的原则。这就需要把个人融合在集体之中，不搞‘地下工厂’，不争个人名誉、地位，不计较个人得失，在必要时能把个人求得的学术成果、找到的好史料贡献出来，全心全意工作。”这个阶段参加的学术工作主要有《太平天国运动史》《中国史稿》(第七册)《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——孔府研究》《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》的编写。后两种书，都是八十年代才陆续出版的。

第二个阶段，是从1978至1993年退休(研究室返聘至1996年)。这个阶段，除协助杨向奎先生办《清史论丛》和受命组稿编辑《清史资料》，帮助清史室年轻学人选定研究方向等庶务外，主要的工作，一是《中国史稿》第七册的扫尾、出版(作为这一册的召集人，他称这是“最繁重、最累人”的工作)，使这部由历史所牵头的“郭氏通史”终成完帙(其实在郭逝世后编写的诸册，为文责自负，即不再署郭氏为主编)。二是参与《清代全史》的工作，特别是组织编撰《清代人物传稿》(上编，即清前期)，花费了他大量的精力。他说，“我对全部稿件200余篇做了加工(其中有些满族人物传记，是约请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同行写的，我只最后审读，并做技术加工)，

统一体例，修改文字，调整内容，纠正错谬，增补史料，甚至完全改写”。何先生逝世后，远在日本工作的郝泽宗先生托朋友致送赠礼千元；这位朋友托我转致。我问所以，才知郝先生就是当年在何先生的指导下，撰写了《汪懋麟传》，并被收入《清代人物传稿》中。他自称“对于室里的工作，我真是全力以赴，不惜时间，不吝精力”，乃实事求是之言，毫无夸张。

也在这个时期，他终于敢就自己感兴趣的学术问题，进行“个人”的研究工作了。这其中贡献最大的，就是明清之际的反清复明运动和清代艺术史。前一项研究，大致始于他读陈寅恪《柳如是别传》。他说：“捧读陈寅恪先生《柳如是别传》时，看到他史实挖掘之深，竟然揭出清初存在的暗潮汹涌的大规模地下反清运动，以及到处取材，驭重若轻，驾轻就熟的史料学功夫，深感震撼。揭出‘复明运动’，科学意义重大，有助于恢复清初历史的全面性、复杂性、真实性、丰富性。”为此，他于1988年撰写了《〈柳如是别传〉读后》。此后的十年，他研究了江南、浙江、湖广、北方的复明运动和复明大案，集中撰写了一系列论文，发前人所未发，揭开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史事。他不无自豪地说：“其中李之椿、平一统、杨鹗、虞胤、陶尔籍等案和史可法扬州督师幕府人物，前人所知甚少；魏耕、李长祥、吴祖錫等的活动，从前虽有研究，但多缺漏，失误。这种状况在理论和史实结合的基础上给我留下了广阔的发挥余地。”这些成果，大多结集为《清初复明运动》，遗憾的是编辑有些自以为是，如将作者自称的“我”统改为“笔者”，文气似乎都不顺畅了。这很让人疑心，责编还动过什么手脚。

对后一项研究，他说：“我自我感觉良好的，有明清隔壁戏研究，和说书艺人柳敬亭、昆曲清唱艺人苏昆生(二人即吴伟业所说的‘楚两生’)研

究。我研究了隔壁戏起源、发展、消亡的全历史过程，描写其状况，分析其必然性，即探索和概括其运行的规律。”三联书店近已编就他的《民族艺人“楚两生”》一书，应该很快能面世。届时，我们一定能体会到，一位史学家在研究艺术史时，对材料爬梳的功夫、对历史背景的把握，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对艺术史的认识。

他晚年自己最为看重的一项工作，就是1997年开始，参加的由王钟翰先生牵头的“四库禁毁书丛刊”的编辑出版工作。对这份工作，他直言：“在那里打工，报酬不高，但我不是奔那个去的，我喜爱这份工作。四库禁毁书大部分是善本、孤本书，我几疑工作过程是进入了皇家翰苑，在那里纵情留览外间难得一面之书。”“我作为学术负责人，首先要保证进入丛刊的禁毁书身份的真实性，不是另一作者的同名书、同一作者的另一书、禁毁后的篡改本，以及其它鱼目混珠本，而不折不扣地确为乾隆禁毁的那种书。”“据估算全套400册约共56万页书，一、二审纠正大部分错误。我三审(我看了总册数的略超六分之五)是最后一关，最后印制出书，是否遗留有错，是我的责任。全部排列无误，是一个艰巨的任务。稍一走神，就有漏网之鱼。”他对山东省图书馆所藏达六百叶的钞本《新纂乾坤宝典天文》装订错误的纠正，正可看他他对书的热爱和对这项工作的高度负责：

二审时，审读的先生发现此书只有前面百余页装订正常，余则混乱错杂，不堪卒读。原来，馆方拆开修裱此书，被工师傅中途忘了标记书页次序，只好拢到一起，分册订线了事，以致如此。最恼火的是，全书无目录、无页码，缺少分割内容段落、排列顺序的标志；又是孤本，缺少对照清理的参考资料。当问题摆到我面前，我知道这是对我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挑战。我反复翻检全



何龄修先生朴素的书架

书内容，发现书中有大量小标题是解决问题的惟一可依赖的线索。经过仔细阅看，我感到小标题都讲列星，也有不同，归为两类：嵌有二十八宿星名的一类；其它的一类，多与气象有关联(分别简称为二十八宿类、气象类)。气象类有线装书页略超400页，但其中百余页排序正确，只有200多页需要我们排出来。小标题多，是绝大帮助，200多页中，只有四个小标题下文字超10页(《中官紫微垣经星占》38页、《太微垣星占》19页为最多，共占80页)，其余为每题数页，以1、2、3、4页者居多。于是我根据小标题与内容的关系、小标题之间的联系、文字的衔接等多方面因素，很快就把气象类书页次序排出来了。经过查书，我了解到从汉到清二十八宿排序无变化，决定利用二十八宿小标题分割这一类书页排定次序。如果不是找到这一分割标志，174页书就成为混沌一片，排序难度就大得多了。分割以后，每一星宿小标题平均只领有6页多一点，找齐就比较容易，排序的问题也得到圆满解决。似乎比较困难的问题，顺利地得到解决，看起来我选择的路子是对的。

读到这里，我们都不禁为何先生感到高兴。

何先生这一代人，是从强调集体主义的时代过来的，常常会认为，一个像社科院历史所这样的单位，必须有些集体项目，才能显示出这个单位存在的必要。他在《中国史稿》第七册《后记》中说，“一个学术机构只是人自为战的局面恐怕也不行，组织集体力量写出有价值的有系统的大部头著作，实在是这类机构的生命线”。在高校工作的学者，也常有类似的要求或期许。其实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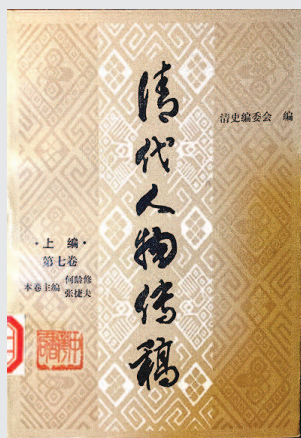
在我看来，办研究所跟办博物馆、纪念馆有点类似。有钱，大可以多办几所；没钱，也可以少办乃至不办，毕竟这不牵扯国计民生。多办或少办，也都跟它们应该如何工作、如何运作，没有太大关系。就古代史研究而言，除了必须合作方能完成的具有基础性或工具性的工作之外(如编绘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，如点校二十四史，等等)，大量的或常态的研究工作，都是要研究者依据自己的兴趣、爱好，取长补短，进行研究。动辄设立课题、上马工程，还要有梯队、有带头，对古代史研究来说，这实在没有必要；研究毕竟不等于编书。

何先生的一生基本是在历史所度过的。他对这个单位的心情，我想是比较复杂的吧。2008年，他75岁，我们以前青年史学沙龙的名义，为他举办了“从事学术研究五十周年”的活动，老人讲的题目是《太子慈娘和北南两太子案——纪念孟森先生庭生一百四十周年、逝世七十周年》。我在5月16日的日记中称“何先生讲了一小时，精神颇好”。这大概是令他感到一丝欣慰的事。倘若用我的市俗的眼光看，何先生给历史所带来的学术清誉，要远过于历史所给他的名与利。

何先生论著，除结集为《五库斋清史丛稿》《清初复明运动》以及很快面世的《五库斋忆旧》《民族艺人“楚两生”》之外，还有些零散论文。很希望将来有机会编辑出版“五库斋清史丛稿拾遗”，以纪念这位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纯粹的学者。

二〇一八年四月廿六日于新都槐荫室

(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)



何龄修先生给历史所带来的学术清誉，要远过于历史所给他的名与利。